

今文淵源

——近百年中國文章之變

刘绪源 著



今文淵源

近百年中國文章之變

刘绪源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今文渊源 / 刘绪源著.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6.4

ISBN 978-7-5552-3801-0

I. ①今… II. ①刘… III. ①散文—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7.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67466号

- | | |
|------|---|
| 书 名 | 今文渊源 |
| 著 者 | 刘绪源 |
| 出版发行 | 青岛出版社 |
| 社 址 |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
| 本社网址 | http://www.qdpub.com |
| 邮购电话 | 13335059110 (0532) 85814750 (传真) (0532) 68068026 |
| 策划编辑 | 刘耀辉 |
| 责任编辑 | 许朝华 |
| 责任校对 | 唐晓梦 |
| 美术编辑 | 梁 娜 |
| 照 排 | 青岛竖仁广告有限公司 |
| 印 刷 | 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 |
| 出版日期 | 2016年4月第1版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
| 开 本 | 32开(787mm×1092mm) |
| 印 张 | 9.5 |
| 字 数 | 180千 |
| 书 号 | ISBN 978-7-5552-3801-0 |
| 定 价 | 32.00元 |

编校印装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38

印刷厂服务电话 0533-8510898

本书建议陈列类别: 散文史论 / 文艺随笔

白话散文的源流

鯤 西

刘君绪源《今文渊源》顷已杀青，这本身不是文学史，但它的视点将来必有助于文学史的编写。自五四新文学运动起，白话取代了文言，这就产生了新的文体——散文。在最初周作人提出这个观念时，他还是非常小心的，因为当时他自己对于西方的散文特别是英国的散文，还没有达到完全了解的境地。随着《晨报》副刊的创立，一时名家都在上面写文章，所以散文体在中国的风行，主要是靠大报副刊起作用，譬如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南方《申报》的“自由谈”、《时事新报》的“学灯”等，都为当时的散文家提供了园地。

本书作者是较早企图解读散文的开拓者，在他早年所著的《解读周作人》里，就尝试通过文体，分析上世纪30年代的苦雨斋散文，此书受到老少读者同样的欣赏，其原因就在于作者从文体来解读。譬如有人要研究周作人的思想，可以从他所推崇的中国的俞理初和英国的霭理斯加以阐述，但这样研究的结果就成为一篇思想性的论文。

而刘君的《解读周作人》另取一途，从文体入手，从而看出了周氏散文的特色就是苦涩。他现在着手的对于整个散文渊源的分析，我以为，也是从这一出发点上开始的。

在白话新文学出现之前，还有一个它的对立面，这就是梁启超的“新民体”。此新民体曾经风行一时，它的文气十分强盛，譬如写罗兰夫人一文，文章铿锵有力，极其容易感动人。但新民体实际上是八股文的变体，所以虽然风行一时，并不能取代白话。胡适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也有梁启超的影响在，他总是以加重语气来推衍，实际上对文章的意思并没有增加，只是一种行文的方法，这就是受梁启超新民体的影响。

周作人对散文文体提出了“余情”这个概念，这就真正说清了散文文体的优雅所在。在西方，蒙田被认为是最伟大的散文家，莎士比亚也受过他的影响。蒙田之所以伟大，就是无论遇到什么题材，他的散文都以亲切自然取胜。他的特色，用一位英国诗人的话说，即他写的就是他脑子里所想的，所以他有一句名言：我懂得什么？（Que sais-je？）他总是这样自问再发而为文，这就把自我、把“余情”调动起来了。在本书中，刘君发掘了许多散文家，也都合乎蒙田的这一句话。自然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这就变成一篇优雅的散文。

上世纪 30 年代，林语堂创办《论语》《人间世》，可谓异军突起。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对左翼思潮的抵御。所谓幽默云云，就是要文章写得真实有味，问题其实不在于幽默，而在于讲真情。从后来历史的发展看，林语堂提倡这种文体，和周作人的文章风格一样，一直影响到抗战时期的《古今》杂志。今天被认为的许多散文名家，有不少就是在这些杂志上成名的。

对于中国白话散文的发展，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因为在西方，学院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本来学院派都是比较保守的，但大西洋彼岸传出的新思潮，逐渐被作家和学人所吸收，这就意味着学院的影响对当代思潮起了主导作用，而散文无疑是受益者之一。

在美国，现在有专门刊登散文的刊物，同时，美国大报上的书评也逐渐散文化了。而我们中国散文将来的发展和繁荣，还不能简单地看待，那还需要靠有力者的进一步提倡，还要看能否出现一些真正具有权威性的大作家——比如五四以后出现的那许多散文大家。窃以为，对中国散文的更大威胁来自小说创作，小说创作的势头远远压过了散文。

如前所述，本书作者从对周作人作品的解读开始，就深深地体现了敏锐的分析力，这部长稿可以说是以解读

周作人为起点的。对于文体的解读，应当说作者是一个开拓者。希望他的研究能对散文文体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我同样希望中国散文能如他所想象的那样继续繁荣下去。

本书作者对资料的收集和对整个散文思潮源流的把握是极为细致的，堪称既勤奋又极敏锐，于此窃不自量引用古人“敛衽无间言”这样的溢辞来称许作者的成就。是为序。

2009年8月写于上海

序二

无文时代细论文

郜元宝

刘绪源《今文渊源》所收讨论现当代散文的十六篇文章，2007年下半年和2009年曾在《上海文学》连载。我看了小部分，因为时间跨度过长，我又一直在国外，无法保持阅读的连续性。今年4月回国，得以一口气读完，这才有了整体印象。

肬西先生序言指出，“这本身不是文学史，但它的视点将来必有助于文学史的编写”，意思是说作者没写出完整的文学史（散文史），但完整的散文史必定采用其部分论述。这评价不低，但我觉得该书和完整的现当代散文史恐怕是两回事。作者压根儿不打算追求任何大而全的散文史，后者对散文和散文史的关键问题也很难像他这样抓得精准，提得显豁，剖析得深刻。而且至少据我所知，已出的几本现当代散文史也没有这样从头到尾用“谈话风”胜任愉快地谈论自己熟悉和热爱的散文。

打头一篇《“谈话风”的诞生》，从1921年周作人《美文》和1922年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对“周作人

等提倡的小品散文”的肯定入手，断言这是“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因为周、胡提倡的是绝对新型的中国散文，古人偶尔也有类似实践，但语言、观念和时代背景毕竟不同。新散文核心是“谈话风”，亦即作文如谈话。活人的口语和活人的思想只有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才真切地进入散文，中国传统文章至此迎来了伟大复兴。

稍具新文学史常识的人马上就会意识到，刘绪源谈的是散文，心里想的却是整部新文学史，因为新文学史的发端就是成功地将口语，将“谈话风”，将现代的活人的说话的精神引入文学。强调这件大事发祥地在散文，也有深意存焉。“谈话风散文”最先成熟的是胡适代表的“长篇议论文”，跟着是周作人融记事、抒情、议论于一炉的文艺性散文（“美文”），两股文脉汇聚，于是“‘谈话风’理直气壮地渗入小说、理论批评、学术随笔——以至成为一种流贯时代的文风”。“谈话风”诞生于散文领域，却迅速“渗入”一切文体，成为新文学普遍的“文风”，一个顺理成章的结论便是：新文学各体文学的“底子”是由散文引入的“谈话风”，或者干脆说，新文学各体文学的“底子”就是最能自由运用“谈话风”的新散文，这就无怪于当时许多作家都异口同声认为新文学的成就要数散文最高。当刘绪源把这个现象概括为现代散文的优

秀传统或中国现代文章的“新传统”时，已不局限于散文，而包括了整个新文学传统。

这是我对他的“潜台词”的引申，但愿没有曲解，因为第二篇《文人传统与创作生命》跟着指出，谈话风散文的基础是“现代中国一个优美而难得的新传统”，亦即现代中国的文人传统。优秀的现代文人都能打破人为的学科界限，“将各种学问乃至一切人类文化成果，尽力打通，复现为有机整体，为完整的个人所用——它的形成，当然与五四以前中国旧学的分工不甚明确有关，但也与这一代知识分子多为中西兼通的才华出众者有关——而‘谈话风’，自然是他们最为得心应手的表达方式”。谈话风散文既从这个新传统流出，便有喷涌不息的源头活水，此中高手也就很自然地拥有较长久的创作生命。相反，“如从来写不好散文随笔，而只能在其他某一文学样式上一逞身手，‘谈话风’偶一上手即捉襟见肘，让人难以卒读——其创作生命要长也难”。我在《鲁迅六讲》中也认为鲁迅小说的底子是文章，小说好，首先因为文章好，而文章好，不仅小说好，还可自由出入小说，转到别的体裁上去。如没有文章的底子，小说写得再不错，也终无大造化，五四以后第二、三、四代作家往往如此。现在看刘绪源也这么说，自然觉得吾道不孤，十分高兴。

《今文渊源》十六篇文章，重心还是“上编”讨论胡适、周作人、鲁迅散文精髓的那三篇。刘绪源显然将这三家视为“谈话风散文”亦即“白话散文”或“新散文”的三个原型，许多二三流作家围绕这三家展开，若众星拱卫北辰。写完谈胡适的《一清如水》，跟着《尝鼎一脔》就一口气历数从现代到当代受胡适影响或具有胡适风格而同样写出一清如水的好文章的傅斯年、罗家伦、朱光潜、潘光旦、朱自清、顾颉刚、贺麟、罗尔纲、邓广铭、费孝通、季羨林、柳亚子、马叙伦、冯友兰、胡绳、吴晗、林汉达、廖沫沙、邓拓、艾思奇、毛泽东乃至张春桥，还有仿佛一直是现代文坛独行侠的钱锺书；写完谈周作人的《在人生的大沙漠上》，跟着《“苦雨斋”的文脉》就往下追寻受周氏影响的俞平伯、废名、江绍原、沈启无，以及受俞平伯影响或神似俞平伯的黄裳、施蛰存、邓云乡、金性尧、纪果庵、谢兴尧、周黎庵、鯤西、金克木、吴小如、舒芜、张中行、唐振常、钟叔河、陈平原，再就是受废名影响或神似废名的沈从文、沙汀、汪曾祺、何其芳、卞之琳、林斤澜、贾平凹、何立伟等，并指出所谓影响，包含了被影响者的创造，这其中就有多种影响源的交叉，也就是说胡适之体和知堂体在后来者手里往往叠合着，而这也因为胡适知堂二人本来就有相通之处。

下编许多篇幅给了林语堂，容易引起误会，好像胡适、周作人、鲁迅之外，刘绪源又塑造了另一位谈话风散文的原型，其实不然。多谈林语堂，只因林语堂和围绕那三大家的许多追随者毕竟有所不同，就是成功地将新散文推向市场，推向大众，而成功的背后就是新散文的大面积异化，于是就有了新散文一路的危机，直到当代和新世纪。林语堂是他所能找到的最好的过渡性人物。并非林氏本事大，暴露了新散文的问题，而是新散文被林氏推向市场和大众之后产生了许多新问题，面临了许多新的危机和走出危机的新的希望。关于林语堂，谈的最成功的地方有两点，一是为林语堂 30 年代创办的三本散文杂志做了精彩的翻案文章，从《论语》到《人间世》《宇宙风》，他力排众议，认为不是越办越坏，而是越办越好；其次就是基本澄清了林氏与知堂的关系，将二者差异和文学交往的亲疏指示得很明白，破除了许多人云亦云的说法（通过两人文章境界和文学观念的详细对比以及知堂给林氏三本杂志实际投稿量的精确统计）。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局限于周林二人，而是为了借此阐明散文发展的一个规律：杂志（编辑）要市场化而作家必须完全独立。

“上编”八篇谈胡适、知堂、鲁迅的众多追随者，“下编”八篇围绕林语堂进一步展开，几乎囊括现当代散文

所有重大问题，视野开阔，腹笥极广。

但这些文章之所以能取得相当成就，还是因为基础打得好，这个基础就是他对现代散文三大原型的精深研究。

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刘绪源是靠研究周作人起家的，上世纪90年代初《解读周作人》一书得到舒芜八字考语：“斯人已去，真赏尚存。”评价不可谓不高（该书近年有增订本）。因为有刘绪源，周作人研究才不让钱理群、孙郁、张铁荣、止庵等北方学者及其弟子们专美。《今文渊源》并非全面谈周，但因为将周跟胡适、鲁迅放在一起比较，又从一个世纪过后“今文”的实际倒过来打量，还是有许多新发现，比如将周作人的“简单味”和“涩味”直接解释为“儿童心态”和“老年心态”的杂糅。另外，认为胡适是以教师启蒙学生的姿态说话，特别从《圣经》（主要是《新约》）耶稣的说话方式）以及世界儿童文学得到启迪，斩钉截铁、不惮反复、直接明快、从容自信。鲁迅则为了可以“对垒”的“敌人”写作，通篇有一种对抗性紧张，加以思想深邃、经历丰富、学问精湛而来的敢于和善于自我反省的“自嘲”，故“气韵生动”，文体省净，辞章华美，难以仿效。至于周作人，则因为绝望于尘世而无意启蒙庸愚，又爱惜羽毛，不愿和“下贱戏

子”战斗，只肯和谈得来的二三老友品味苦茶，兴之所至辄做一夕之闲谈，“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同样不易企及。这种概括当然不全面，有些地方也还可以进一步挖掘，但他所谓“读者意识”，并非单纯叙事学意义上的“隐含读者”，而是作家整个心态，所以他能从读者意识化开去，牵连地谈到三位大家其他许多方面。

把作为原型的这三家谈清楚了，其他也就可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特别是经过谈林语堂的两篇文章有力的一转，清晰地昭示现代散文从起初的三座高峰逐渐扩大地盘而又“一代不如一代”的实情。

鯤西先生说这部书不是文学史，大概嫌它叙述不够全面，材料不够丰富，但我觉得研究现当代散文，以胡适、周作人、鲁迅三家为纲，实是最好的结构方法，也是最好的观察方法。就像造一座大厦，结构不好，或结构牢固却没有考虑到空间视野的分配，纵然弄成资料长编或蜘蛛网似的无所不包的庞大体系，也无济于事，而这正是许多散文史著作的通病。《今文渊源》从晚清梁启超“新民体”、民初《礼拜六》杂志谈到 90 年代以后文化大散文乃至读书类杂志的文风，上下一百多年，正文却十三万字不到，而绝不让人感到单薄，就因为抓准了支柱性问题，其他枝节问题各就其位，在适当的地方穿插进来，寥寥

数笔，画龙点睛，境界全出，所以看似以议论为主，实则具有相当厚重的历史感。

我觉得这可能是破除目前积重难返的装腔作势华而不实的学院腔而简化文学史写作的一种有益的尝试。

所谓“今文渊源”，乃是往上追溯“旧林故渊”，更往下探察“今文”得失，一方面是历史研究，另一方面也是对当代散文的批评。批评的笔墨不多，往往是在梳理散文史主干问题时连类及之，但因为从源头看出问题的所在，点到为止，却十分有力。

比如刘绪源虽然并不怀疑90年代以来那些中年知识分子的文章的重要性，但对文风之丕变还是明确表示了不满。有辩之者称，“进入90年代，大量关系国计民生的和世界性的问题推到面前，它们不同于那些文艺问题，它们本来就是迫切的、艰深的，怎么能要求再像过去那样去做好看的文章？”许多人不就是被这种理直气壮的辩解给吓唬住了吗？但刘绪源根据散文历史给予的反驳十分精彩：

我想起了五四以后的那几代学人和他们的文章论著，他们又何尝不是面对关系到中国和世界的种种迫切的难题？他们的研究，也深入到了大量艰深

的学术领域，其中也包括社会科学各领域，但他们的文章，仍能写得一清如水——这样看来，新一代的不少学人，之所以不能写出像前辈那样的美文，主要还是未能充分认识五四以后中国文章优美可贵的新传统。他们多为留洋的博士（其实老一代学人中也不乏西方名校博士），他们所学的是国外学院派论文的论证方式，但他们“入乎其内”，却未能像第一代学人那样“出乎其外”。在面对中国大众时，如果还只习惯于以课堂讨论、论文作业的方式说话，那就不能不留下遗憾。

话说得诚恳直白，值得仔细玩味。

再比如，作为 90 年代以来文艺性散文、小女人散文和文化大散文随副刊和市场发育迅速繁荣的亲历者，刘绪源冷静剖析了其盛极而衰的原因，结论是散文不宜一味走“虚”的路子，应适当偏向“实”。这使我想起周作人提倡“美文”但自己并不大写特写，倒是很快转向思想批判和文化整理性质的学术随笔。刘绪源也并非说散文只能写实不能虚构，只不过希望“去甚去奢去泰”，别像鲁迅当年批评的那样，“轰的一声”，千人一面。这又使我想起 20 年代末有人攻击散文不真实，读者易生幻灭，

“散文作品中最便当的体裁，是日记体，其次是书简体”时，鲁迅针锋相对认为散文既是创作，就不应拘泥于实事，“靠事实来取得真实性，所以一与事实相左，那真实性也随即灭亡。如果他先意识到这一切是创作，即是他个人的造作，便自然没有一切挂碍了”。相反，“幻灭之来，多不在假中见真，而在真中见假。日记体，书简体，写起来也许便当得多罢，但也极容易起幻灭之感；而一起则大抵很厉害，因为它起先模样装得真”。

新世纪散文的危机，借用鲁迅的话说，“体裁似乎不重要”，关键在于精神萎靡鄙吝，缺乏“强烈的独创的创作”。“新散文”最初的高峰过后，一直就有危机，并非自今日始。30年代鲁迅写《小品文的危机》就并非只针对小品文。是他，最先看到了被我们今天描绘得天花乱坠的30年代文学繁荣背后创造力的减弱。刘绪源没这么明说，但他谈周作人及其追随者，多着眼于彼此差异，亦即追随者不如前驱者的地方（当然也点出了追随者的某些创造）；谈“鲁迅风”，根本不想网罗追随者了，因为追随者与被迫追随者更不可同日而语。胡适的追随者似乎好一些，但正如上面围绕《读书》杂志的文风分析的那样，当下学术散文和论文作者，真能写得像“白话皇帝”胡适那样“一清如水”的，恐怕也再难找出几个。尽管